

辞海

新知

上海辞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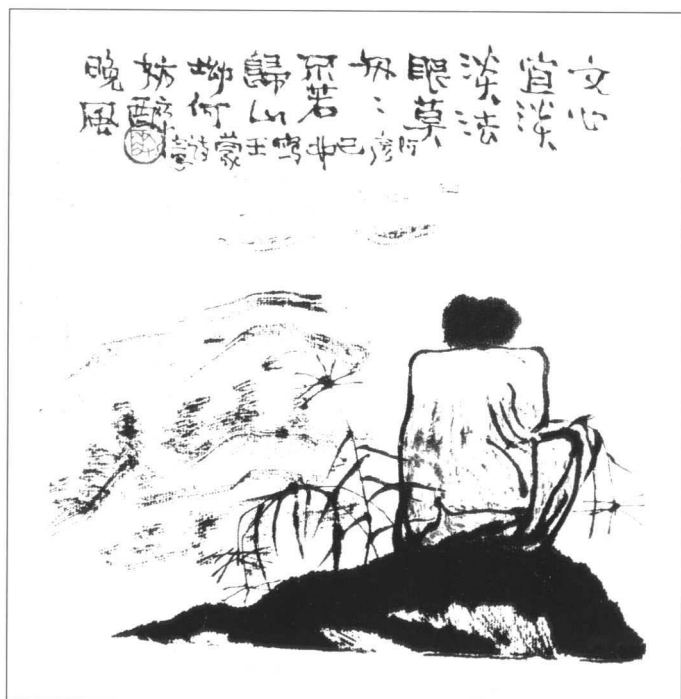
NO.5



王 蒙 / 诗
谢春彦 / 画

无 题

文 心 宜 淡 淡
法 眼 莫 匆 匆
不 若 归 山 坳
何 妨 醉 晚 风





第五辑 录

□ 大 学 教 育

童世骏	大学的理念 ·····	2
谢安邦	超越美国大学模式 ·····	10
谢希德	最后一次谈教育 (访谈) ·····	15
葛剑雄	教育问题之我见 ·····	20
谢 泳	中国早期现代大学回顾 ·····	33

资料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18) 专家论坛 (32) 钱穆谈教育 (37)

钱乘旦	回溯 1000 年 ·····	39
李 唐	关于知识的知识 ·····	47
于 海	访问查尔斯·泰勒 ·····	54
吾 淳	现代西方艺术的衰竭 ·····	58

荣新江	敦煌学: 21 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	65
徐文堪	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 ·····	79
申小龙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	76

陈思和	50 年代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重读赵树理的名篇《锻炼锻炼》 ·····	81
-----	--------------------------------------	----

杨 林	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学 ·····	90
袁峻峰	未来上海的重要岛屿——九段沙 ·····	95
景 爱	黄河已成内陆河 ·····	99

■ 观点

- 凌继尧 柏拉图的“理念” ····· 101
黄绍坚 变形的历史 ····· 103

■ 关键词

- 谢遐龄 按劳分配 ····· 106
孙少晶 文化工业 (编译) ····· 108

■ 文谭

- 止庵 旁观者之一瞥 ····· 112
李济英 卡尔·路德维希酒桶 ····· 115

■ 谈艺

- 杜心源 影像中的说不可说 ····· 118

■ 时尚

- 张秀英 质疑“白领文化” ····· 123
王蒙、谢春彦 无题 ····· 封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辞海新知 .5/ 李伟国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6

ISBN 7-5326-0678-3

I. 辞... II. 李... III. 百科全书—中国 IV. Z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5732 号

《辞海新知》编辑部

主 编: 李伟国

编 辑: 吴雅仙 赵荔红 冯 涛

《辞海新知》第五辑

责任编辑: 赵荔红

版面设计: 杨钟玮 明 婕

封面设计: 杨钟玮

出 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 话: 021 - 62472088

传 真: 021 - 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26-0678-3/N · 11

定 价: 6.80 元

大学教育

编者按：

1998年是中国现代大学百年诞辰，许多文章都在谈论一个共同的话题：未来的大学模式是怎样的？新千年已经到来，教育改革雷厉风行。怎么改？需要冷静地思考。20世纪初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其非凡的气度、开阔的胸襟创办现代大学，他们基本上遵循德国大学模式，以培养崇高的人格精神为办学的宗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模式适应了现代技术文明的发展而达到鼎盛期，美国人自豪地说，全世界2/3的优秀大学集中在美国，他们拥有最先进的设备、最多的人才、最完善的体制，也产生最多的知识成果，于是，各国竞相模仿其体制。然而，有识之士清醒地看到，功利主义的滋长正遏制着“大学精神”的发展。建国以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有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未来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在学习美国大学优良的管理体制的同时，重温大学精神，重寻大学理念，重归大学之道是新世纪大学教育发展必须重视的；也有专家认为，我们不能只空谈大学的理念，而应更多地关注大学的许多具体的问题，如：办学方式的多样性、组织形式的变更、管理的革新、人才的培养、学术水平的提高，等等。在这里，我们请有关专家从不同层面撰写文章，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教育是立国之本”这句话已深入人心，希望这组文章能有助于读者的思考。

大学的理念

..... 童世骏

雅
集
集
集

贝特兰·罗素：我们首先应当了解我们想培养的人的类型，然后才能知道进行什么样的教育为好。

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学校，学院升格为大学，几所普通大学合并成一所超级大学，对这种现象，可以作种种解释，从人才培养规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客观需要，到学校行政级别提高、学校名称含金量提高的主观愿望。这些解释主要是从大学的外部因素出发，而不是从大学的内在精神出发。本文拟对德国人所说的“大学的理念”，作一历史的考察，或可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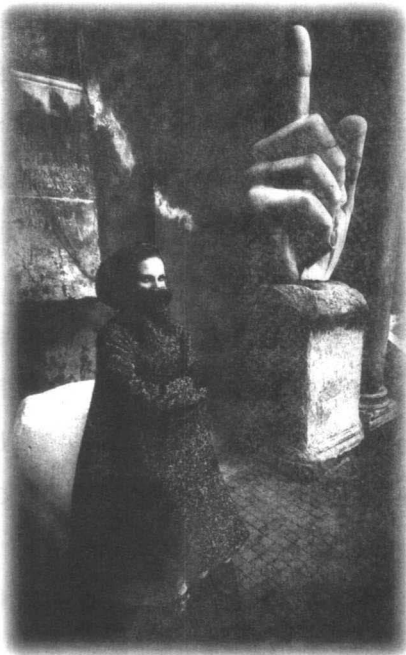
“大学的理念”（die Idee der Universitaet），也可以叫做“大学的观念”，但译成“理念”，更能提醒人们注意形成这个说法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在提出和阐发“大学的理念”的过程中，费希特、谢林都起过重要作用。黑格尔虽然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及这两位同胞，但他不仅担任过“大学的理念”之诞生地——柏林大学——的校长，而且还以其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的哲学体系，给后人“理念”的理解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来说，有形的文化作品和社会建制是无形的理念的外在表现；文化和制度离开了内在的理念，就仅仅成了一具僵尸。大学之理念，也就是大学之灵魂、

大学之生命。当然，理念之体现于外总是不完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念与特定时期的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又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谈论大学的“理念”，也就是谈论一种与现实有相当距离，我们可以用来衡量现实、批判现实的大学的“理想”。

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洪堡(W. von Humboldt)在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在柏林大学之前，欧洲已经有了不少大学，最早的可一直追溯到12、13世纪。从形式上看，柏林大学像其他大学一样仍然包括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四个学院，但洪堡和柏林大学的其他精神之父们所阐发的大学的理念，为柏林大学灌注了独特的生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始祖。洪堡等人的大学理念包括这样几个

方面的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质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研究的统

一。



有形的文化作品和社会建制是无形的理念的外在表现；文化和制度离开了内在的理念，就仅仅成了一具僵尸。大学之理念，也就是大学之灵魂、大学之生命。

欧洲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代表有

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设于波洛尼亚城。1067年建立，由教会经办，只设法学和艺术科。12—13世纪为其兴盛期，是研究罗马法和宗教法规的主要中心；1200年设医学和哲学系；17世纪设理科各系；20世纪80年代开设大量的学术和职业课程。

法国巴黎大学：法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设于首都巴黎。源于中世纪的主教学校和僧侣学校。1211年经教皇承认正式建立，初设神学、法学、医学、文学4个学院，以后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知识中心和教学中心，后来历经分合，至1968年，分裂为13所独立的综合性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设于牛津城。12世纪中叶创办。初期的几所学院建于13世纪中叶——霍尔学院(1249)，巴利奥尔学院(1263)，默顿学院(1264)。至1988年，已发展成由35所正式学院组成的世界著名大学。

创建柏林大学的历史背景，是作为德意志最大公国的普鲁士在法国的攻击面前不堪一击，不仅割让土地，而且失去了几所重要的大学。也就是说，柏林大学的创建，是德国人努力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损失的一个结果；从一开始，柏林大学的办校宗旨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在洪堡等人看来，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他们设法向统治者表明，恰恰是这种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才更符合普鲁士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根本利益。

这里所说的“学术”，德语的说法是 Wissenschaft。这个词大致对应于英语的 science，但又与之有重要区别。英语的 science 通常指自然科学，或者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数理—经验科学。但德语的 Wissenschaft 则包括更广的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也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作为这种意义上的“科学”赖以存身的社会建制，大学（University 或 Universitaet）必须真正是“大”学：不仅是学校规模大，而且是学科范围广（universal）。只有这样的以科学为核心的大学，才能培养洪堡所说的“全面人格”（vollstaendige Menschen），才能成为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典范和中心。从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纺织大学”、“交通大学”、“科技大学”，都包含了内在的逻辑矛盾，甚至那些没有哲学系的大学，也很难称得上名副其实。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理所当然地属于广义的科学之列，而首先是因为这些门类众多的科学需要由哲学来加以统帅。

如果说以上两点（学术自由、科学统一）分别是“大学的理念”的否定的方面和肯定的方面的话，那么，第三个方面，即教研并重，则是具体落实这两个方面的方法或者措施。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教学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强调教学与研究的并重，重点在于研究。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基地，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法兰西学院一起，开创了现代科学建制的三种基本形式——科学学会、科学院和研究性大学。从教育史而不是科学史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即把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授内在地结合在一起，新人才在新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培养出来，这

样的新人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知道如何去掌握已有的知识,而且也知道如何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二

谈论“大学的理念”，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雅斯贝斯的论述。雅斯贝斯的“大学的理念”，从其具体内容来说，仍然是上面讲的那几个方面。

雅斯贝斯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认为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从学生的方面来说，他们必须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的精神从事学习，因而他们必须具有学习的自由。从教师的方面来说，他们的责任是传播科学真理，因此他们必须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

关于大学教育与科学的关系，雅斯贝斯指出必须分辨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适应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的科学教育；另一种是可以引导和充实人们生活的教育。大学教育之为大学教育，或者说体现“大学的理念”的大学教育，不在于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或者说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而在于后一种意义的科学教育，它所注重的是科学的本真意义，是科学的方法、基础和目标。在雅斯贝斯看来，科学的方法、基础和目标，是超越各门科学本

身的，是需要借助于哲学而得到揭示和体验的。雅斯贝斯虽然不像洪堡和施莱尔马哈尔等人那样在机构设置上主张哲学学院

在20世纪，大学的理念几度引起德国知识界的重新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3年，雅斯贝斯发表“大学的理念”一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斯贝斯在受命重建德国高教体系的同时于1946年以相同题目出了一书。1961年，此书又出了新版。（作者注）

雅斯贝斯，卡尔·特奥多尔（Jaspers, Karl Theodor, 1883—1969）德国—瑞士哲学家。出生于德国奥尔登堡。先后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后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巴塞尔大学任教。他的著作有《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3卷本）、《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哲学的信仰与启示》等近40部。早期的研究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性质作了区别；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之一，认为存在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这个大全向思维和信仰展示一个空间，哲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存在。二战后，他关心社会政治，倡导保持人的独立性的“新人道主义”。

居于首位,但仍然主张哲学在大学的理念中具有中心地位:“大学的内在精神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活动为标志的。”

这种“哲思”活动,雅斯贝斯与康德一样认为应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重点。这样的思考活动是需要条件的,所以大学生必须学习既有的知识。但真正的哲思活动并不表现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中,而表现于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的缘故:“按照我们的大学理想,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科学的科学的精神。只有他才是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

在雅斯贝斯的论述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所谈到的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建制之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是要由相应的建制来保障的。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之所以成为各国创建和改革其大学制度竞相仿效的榜样,主要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哲人们对大学的理念的阐述,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们为体现这个理念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校长由教授会选举;从无薪讲师到正教授有一系列的晋职考核制度;教师可以自由选择开设的讲座和研究的课题;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修读的科目和课程;大课讲演、小班讨论和教学实验室中的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很快成为各国大学的共同设置。到了20世纪,雅斯贝斯所重视的不是要根据大学的理念来配置大学的建制,而是要防止大学的建制失去大学的理念,沦为空洞的形式。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在其哲学自传中,雅斯贝斯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从童年起就形成的对于大学的崇敬——“学校的建筑、讲堂、传统的礼节对我都是神圣的东西”,大学“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真理的化身”,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大学经历中,最使他痛心的并不是纳粹时期官方对作为自由精神之实现的大学的暴力摧毁,而是在纳粹上台以前大学内部已经出现的自由精神的衰退和大学教授与学生对自己崇高责任的懈怠。对雅

斯贝斯来说，这意味着大学的终结。

三

1986年，在海德堡大学建校600周年的时候，尤根·哈贝马斯也发表了一篇以“大学的理念”为题目的演讲。在哈贝马斯作这个演讲的时候，大学的理念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既不是纳粹这样的黑暗的政治势力的摧残——战后德国的非纳粹化政治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不是雅斯贝斯心目中那种品格高尚、才华横溢、个体精神永不衰竭的精神贵族的零落——虽然60年代以后大学教育的迅速普及确实有理由使精英主义者更加忧虑；而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之下出现的大学成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附庸的趋势。这种趋势，或许也可以说成是大学的“理念”面临着被大学的“功能”取而代之的危险。

这里说的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功能”的区别，大致上对应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区别。哈贝马斯把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看作一个交往合理化过程，也就是与交往行动具有互补关系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与此同时，现代化过程也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科层行政系统从以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分离出来，并日益膨胀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大学，处于生活世界和系统两方面的关系之中。大学的建制为大学成员提供活动规范，对全社会起示范或影响作用，大学还成为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传递和更新、个体的教育和培养的主要场所。在这些意义上，大学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大学一方面受文化内部分化的影响，呈现出专业设置越来越多而杂的趋势，离开“科学统一”的理想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受行政系统，尤

哈贝马斯，尤根

(Habermas, Jürgen)

(1929~) 德国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就读于哥廷根大学，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博士学位。1961年始先后在马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等任教。曾获斯图加特的黑格尔奖(1974)、弗洛伊德奖(1976)。他的代表作有《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认识与兴趣》、《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等。哈贝马斯被认为是目前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代表，被视为20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深切关注公众意识形态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理性的信念。

其是经济系统的需要的压力,把重点越来越放在科学的技术应用价值上而不是科学的文化启蒙价值上,放在教育的训练生产技能的职能上而不是教育的培养全面人格的职能上。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建制”,大学要体现它的“理念”;作为“系统”中的一个“组织”,大学要实现它的“功能”。现代社会中的大学,就处于这样的两难之中。

面对这个两难,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概括:承认大学的功能,但也捍卫大学的理念;为了协调这两个方面,不能仅仅诉诸古典形式的大学的理念,而必须对大学的理念作新的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大学所处的现代社会,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复杂性,对它的考察不能仅仅依靠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参与者的视角,而要借助于社会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从后者出发,大学确实从属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必须履行它在这个系统之中的功能,必须同其他功能部门发生互动。但社会不能仅仅从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成为一个系统;文化的更新和传递、社会的整合、个体的培养,仍然只能发生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之中,而无法用行政的手段或市场的途径来代替。在哈贝马斯看来,大学的理念的核心是一种以大学为形式的学习过程——他这篇讲演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过程的核心,就是合理的交往行动,也就是平等、自主的不同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更好论据”为权威的达成有关“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共识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研究过程——科学家共同体对于科学真理的合作的探索,在哈贝马斯那里是交往合理性的一个典范。这可以理解为哈贝马斯对大学的理念中“教研并重原则”的重新表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科学统一不能在实质上建立在一门超越科学的科学——也就是哲学——之上,而只能在形式上或程序上建立在各门科学共享的合理交往或合理论辩之上。这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大学的理念中“科学统一原则”的重新表述。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主体之间的无强制的、自由的交往,这可以看作是大学的理念中“学术自由原则”的重新表述。这样,洪堡和雅斯贝斯的那种大学的理念被保持了,但他们的思想当中十分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被克服了,他们赋予

哲学的独特地位也被降格了。交往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乌托邦，但这种乌托邦并不存在于极少数精英身上，而潜在于每个人的语言活动和交往能力之中。大学的理念仍然同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哲学不再高高在上向各门具体科学颁布原则和目标，而是同各门具体科学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后者而得到验证，另一方面为后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哲学不再是统帅，而仅仅是卫士。

蔡元培在1925年曾作过一个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讲演，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讲演中，他也对自己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创始人的大学观念或大学理念，进行了多次阐

发。从蔡元培对于大学系科设置的设想、对于“教授治校”和“思想自由”的提倡、对于“研究学问”的强调等等来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同德国人的大学理念非常接近。大学的理念就其历史起源来说是德国的，就其精神起源来说是西方的（雅斯贝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其理论价值来说

惟二十年中校制之沿革，乃颇与德国大学相类。盖德国初立大学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以其应用最广，而所谓哲学者，包有吾校文、理两科及法科中政治、经济等学，实为前三科之预备科。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18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遂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中最重要之部分。近年弗朗福脱新设之大学，遂不设神学科矣。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摘自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则应该说是全人类的（哈贝马斯强调其交往行动理论的普遍主义性质，可作为这个观点的一个支持）。百年之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移植和培育的这种大学理念，对于当今中国办教育办大学者的思考和行动，仍有参考价值。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超越

美国大学模式

..... 谢安邦

一提到 20 世纪初的美国大学，人们的脑海中就浮现出这样一幅精致的画面：爬满长春藤的校墙，围起一个温馨而宁静的空间，绿茵、长廊、古色古香的建筑，温文尔雅的教师和满脸稚气充满好奇的学生，四下散落的长椅，一卷在手、屏气凝神的读书人……。这样的描述与其说是人们对高贵典雅的、具有贵族精神气质的传统大学的怀旧，不如说是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百般无奈而寻求的一种寄托。

也已经荡然无存了。在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克拉克·科尔眼中，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时代。大学不再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一座知识分子垄断的城镇，而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当中，昔日的一致性已不复存在，这里区分出若干个社群，不同的社群之间甚至社群内部都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剧烈竞争。大学，对于学生来说是个“混乱”的地方，自主选课既令他们体会到自由的感觉，又常常让他们陷入摇摆不定的境地；对于教师而言，校园的那种安逸、有条不紊已一去不复返，在强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下，教学与研究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而研究的

在美国，经过 60 年代学潮的纷纷攘攘，70 年代高等教育的扩张，如今，即使是那些历史最悠久、思想最保守的大学，昔日校园所特有的那种宁静的、充满学究气息的氛围

无功利性,那种纯粹为了好奇心的满足而求知、求真的研究旨趣,也越来越淡化了。为了在剧烈的院校竞争间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展机会,大学不得不正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为获得政府和产业界的资金扶持,不得不屈尊沦为受人利用的“工具”;为满足学生作为消费者的现实需要,又不得不像开快餐店一样,给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形形色色、花样繁多的课程“菜单”。如果说真正的大学独立自主从来没有实现,那么在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就更无异于痴人说梦!

这就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概貌。在一个原本就缺乏深厚文化底蕴的新大陆上,在一个曾经崇尚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度中,在一个市场哲学、竞争理念已浸透漫及各个角落的社会里,美国大学的这种存在状态实属必然,是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发展轨迹的逻辑再现。

然而,无论如何,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目前已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模式。正如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任院长罗素夫斯基不无自豪地宣称:“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中足有2/3~3/4是在美国……,而在我们的经

济和社会里,又有哪一个领域能作同样的声明?……恐怕没有人这样说过:今天的美国拥有世界上2/3最好的钢铁厂、汽车制造厂、银行或政府机构。不过,我倒认为,我们拥有世界上2/3最好的医院。由于其中多数都是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就更加充实和强化了我的论点。”

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奖项大多落入美国大学教授手中的事实表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整体研究实力的确无人能与之匹敌;

美国研究型大学拥有巨大财富,尤其是位居前列的几十所大学,其各自的校产总值,数额之大令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在惊诧之余自叹弗如,在雄厚的财力支持下,大学研究设施之齐全、现代化程度之高,也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研究型大学对各个学科的学术精英的拥有量,也堪称天下第一,在极具诱惑力的资助政策导向下,在先进的研究条件吸引下,美国不仅从世界各国挖来大批的学术骨干以充实自己的研究队伍,而且把他国最有

潜力的尖子学生,大批地充实到自己的智慧 积极影响。

和思想宝库之中;

到了20世纪,特别在二战之后,整个世

美国研究型大学拥有相当部分在世界
上最具竞争力的研究生课程,它们在培养高
层次专业人才的能力方面堪称世界一流;

世界进入了一个技术文明的时代。冷战格局的
形成,把世界上两大阵营拖入一个旷日持久
的军备竞赛之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军事高科技领域的较量和竞争最为剧

.....

烈。正是由于战备上的需要,美国以国家的
力量向部分大学注入巨额的研究资金,鼓励
其开展军事高科技研究。在政府的扶持下,

总之,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是成功的,
它成功的秘诀在于顺应了现代社会对科技发
展的强劲需求。

部分大学的研究实力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
逐步奠定了其研究型大学的地位。事实上,
当前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许多民用高科技研
究,如网络信息技术、民用航天技术以及原
子能等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都与早期军事高
科技研究直接相关。

回顾世界大学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
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一种占
据主导地位的为世人所瞩目的大学模式:中
世纪时期,神学居于垄断地位,对《圣经》
的评注诠释的权威性决定了一所大学所占据
的地位,在罗马教廷的庇护下,当时充满浓

厚宗教气息和道德说教氛围的巴黎大学,一
度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近代以降,随
着科学的兴盛,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对知
识、真理的无功利性目的的追求成为知识机
构的核心价值,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
学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19世纪乃至

与此同时,战后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客
观上刺激了人们物欲的急剧膨胀,在一个鼓
励消费、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技术功利
主义也大行其道,产业界以委托或合作的形
式,向大学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研究经费,为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保障。

20世纪初,德国大学模式曾一度辉煌,成为
各国大学效仿的对象,实际上,目前美国研
究型大学的成长也曾受益于德国大学模式的

总之,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形成,是
20世纪国家主义和功利主义混合作用的结
果,它反映了技术文明时代的社会政治、经

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这一时代的核心价值——科学效率观的集中体现。

但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成功,并不表明它是现代大学中最完美的办学模式。人们对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往往倾向于它雄厚的研究实力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普遍评价不高。姑且不与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相比较,即使是与国内的许多文理学院相比,其实际水平也相对逊色。

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的红衣主教纽曼就曾极力反对在大学中开展科学研究,他认为大学是培养学生情趣,发展学生理智的场所,而唯有教学才能承担这一职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洪堡却有不同的理解,他主张在大学中教学与研究并存,以研究为主,他认为人的精神自由的表现形式是个体的独立自主,在个体独立面对疑惑、独立的自我发现之中,人才能达到发展自身的最终目的。无论是纽曼还是洪堡,两人虽然在大学的功能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但是,他们理论的出发点却是一致的,即不论是强调教学还是强调研究,其核心目的都在于实现人的精神自由和理智的充分发展。他

们所共同指责的就是功利性的、以实用为目的的大学教育观。

纽曼的大学观反映了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的绅士教育传统,而德国柏林大学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洪堡的大学理想。如果追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毫无疑问,美国的大学是脱胎于英国的大学传统,此后又嫁接了德国的柏林大学模式,成型后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虽然不能说全然丧失了母体原有的性状,然而,传统英、德大学的基本精神内涵委实也所剩无几。

这一变异不能不说是一种进化。因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确实已经成为技术文明时代的骄子,它不遗余力地发展研究生教育,提高了专业化教育的水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雄厚的财力标示着它一身的王者之气。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掩盖它的衰败之象。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高等教育界就有人对研究型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以致造成二者主次颠倒的现象颇有微辞,迄今,这一局面非但没有丝毫缓解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并成为众矢之的。偏重于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左右着教师的行为取向,严重影响了他们从事教学工作的热情;高强度的竞